

西伯利亚文学简述

作者对西伯利亚文学并没有什么研究，只是读过一些作品和资料，觉得很有介绍的价值，才决定试著作一点介绍。由于水平和资料所限，难免挂一漏万，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在探讨西伯利亚文学的初期，曾得到赵先捷副教授的热情帮助和指导，谨在此向他致谢。

封面设计：秦 多

西伯利亚文学简述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71,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3}{8}$ 插页 2

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900

书号 10208·148

定价 0.40 元

出版说明

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学有比较久远的历史，有一代一代的著名作家和出色的作品。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它逐渐成为苏联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则更引人注目，并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我国至今还缺少一本专门研究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文学发展的著作。本书作者搜集了这个方面的材料，从历史的发展和创作的变化上，对这一地区的文学作了简明的叙述，对于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了内容介绍和艺术分析，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因此，本书可供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苏联文学的读者阅读参考。

目 次

出版说明·····	1
引言·····	1
西伯利亚文学的产生·····	3
十月革命前后和二、三十年代的 西伯利亚文学·····	6
战后的西伯利亚文学·····	34
结束语·····	133

引 言

西伯利亚位于苏联领土的亚洲部分，西起乌拉尔，东至太平洋沿岸分水岭山脉。全区面积约一千万平方公里，比苏联欧洲部分的领土大一倍多。按自然条件，本区可划分成两个部分：乌拉尔至叶尼塞河中间为西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以东为东西伯利亚。按照行政区来划分，西伯利亚境内包括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一部分；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秋明、克麦罗沃、伊尔库茨克、赤塔州和马加丹州的一部分；戈尔诺-阿尔泰、哈卡斯、图瓦自治州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六个民族州。全区人口约二千五百万，占苏联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其余的是众多的少数民族。

西伯利亚地域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苏联的重要经济建设基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殊为重要的地位。这种现实为西伯利亚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西伯利亚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来，西伯利亚文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影响日益扩大，远远

超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范围，引起了苏联文学界的重视，在区域性文学中已跃居首要地位。在一九八〇年召开的俄罗斯联邦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米哈尔科夫在报告中提到十三部近期获奖的中、长篇小说，其中，西伯利亚作家的作品就占六部。它们是：格·马尔科夫的《西伯利亚》，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阿·科普捷洛夫的《支撑点》，瓦·拉斯普京的《活着，可是要记住》，阿·伊凡诺夫的《永恒的召唤》和维·利帕托夫的《这都是关于他的事》。此外，米哈尔科夫还谈到一些近年来愈益引人注目的作家，其中西伯利亚作家也不占少数，如顺季克，科普佳耶娃，萨尔塔科夫，雷特海乌等。他在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对西伯利亚文学发展的重视。他说：“有关发展国家农业、提高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文化的党的文件，在作家协会的社会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作协书记处的全部活动都渗透着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组织在完成党的二十五大和勃列日涅夫的指示方面所作出的成绩的关注。”^① 西伯利亚文学在苏联的地位和受到的重视，由此已可见一斑。

① 见米哈尔科夫报告：《深入到生活中去，更加鲜明、天才地展现苏联社会的创造性》，苏联《文学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

西伯利亚文学的产生

西伯利亚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通常把《西伯利亚编年史》视为西伯利亚文学的开端。当时，西伯利亚已经有了丰富的编年纪事文学和游记文学；同时，科学、文化和艺术也相继发展起来。至十九世纪，西伯利亚文学已有相当的基础。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革命民粹派等先后流放西伯利亚，对当地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作家在西伯利亚的文学活动，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西伯利亚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流放到雅库特的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正是在这里开始文学创作的。他的整个一生都同雅库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西伯利亚文学流派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十月革命以后，西伯利亚文学迅速发展起来，涌现了大批有才华的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由于西伯利亚地域广大，作家很分散，所以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并创办一个刊物，以便联合和培养西伯利亚作家。鉴于这种形势，一九二一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部分西伯利亚作家创办了《西伯利亚火光》这个刊物。一九二五年秋，《西伯利亚火光》编辑部的作家倡议成立一个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学组织。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第一次西伯利亚作家代表大会终于在新西伯利亚城召开。会议宣告西伯利亚作家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了作家协会理事会，由符·扎祖勃林出任作协理事会主席。《西伯利亚火光》就此成为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从此，西伯利亚文学更加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一九二八年，第二次西伯利亚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了。会上，作协理事会主席扎祖勃林首次正式提出了西伯利亚文学这一概念。会上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取得了一致看法，认为西伯利亚文学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它独立的内容和特色，是以反映西伯利亚的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地区性文学，同时又是俄罗斯文学具有独特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西伯利亚文学的概念从此确立下来。

西伯利亚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广泛，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颇有特色，为我们了解俄罗斯的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高尔基曾经预言：“既然西伯利亚在科学界出现了门捷列耶夫，在艺术界出现了苏里柯夫，那么在文学界为什么就不能出现这样的大师呢！我以为，我们未来的大小

说家将在西伯利亚人之中诞生。”事实证明，高尔基的预言十分正确。半个世纪以来，一支宏大的作家队伍在西伯利亚大地上成长起来，其中有许多人成就卓著，在整个苏联甚至国外都颇有影响，如维·希什科夫，符·伊凡诺夫，莉·塞甫琳娜，阿·法捷耶夫，尼·阿谢耶夫，列·马尔蒂诺夫，瓦·费多罗夫，格·马尔科夫，谢·扎雷金，维·阿斯塔菲耶夫，瓦·舒克申，瓦·拉斯普京，康·谢迪赫，阿·科普捷洛夫，谢·萨尔塔科夫，瓦·阿札耶夫，维·利帕托夫，阿·伊凡诺夫，亚·万比洛夫，帕·巴若夫等。此外，还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也迅速成长起来，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桑基（尼福赫人），舍斯塔洛夫（曼西人），雷特海乌（楚克奇人），霍泽尔（那乃人），库里洛夫（尤加吉尔人），科克舍夫（阿尔泰人），多莫扎科夫（哈卡斯人）等。西伯利亚地区还办有多种文艺刊物，如《西伯利亚火光》（新西伯利亚），《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北方》（彼得罗克烈波斯特），《叶尼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贝加尔》（乌兰乌德），《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辽阔的西伯利亚》（秋明），《安加拉》（伊尔库茨克）等。其中的一些刊物，如《西伯利亚火光》和《远东》，在苏联文学界具有一定影响。上述刊物对于促进西伯利亚文学的发展，都起过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

十月革命前后和二、三 十年代的西伯利亚文学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随着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发生，西伯利亚的文学活动便日益高涨起来。一些作家，如奥利格尔，艾里利克·埃里斯京，切尔内赫·雅库茨基，斯塔夫罗金，克拉夫佐夫等，思想和创作活动颇为活跃，写出了一些倾向性较为明显的作品。第一次俄国革命遭到失败以后，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社会生活更加黑暗。但是，西伯利亚的工人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一九〇九年又发动了新的革命运动。当时，已有一些作家在创作中流露出同情工人斗争的情绪。他们高度评价政治流放在西伯利亚发生的深远影响，热情赞颂十二月党人和波兰起义者的革命精神。作家斯塔夫罗金还创作了回忆米哈依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的作品：《米哈依洛夫在托博尔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琐事》等。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在革命失败以后发生了动摇，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作品的倾向是消极的。但就总的创作情况而言，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作家的散文创作反映了当时的时代

精神，描绘出艰苦斗争岁月的血腥现实，以及各种不同阶层的人对革命的立场和态度。

其中，作家奥利格尔所走的道路和创作的短篇小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奥利格尔起初曾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从事过地下工作，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从一九〇六年起，他脱离了革命活动，一心从事文学创作。这正是那些年代里部分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道路。革命对他们的浪漫主义吸引力一旦消失，他们便会意志消沉，疑虑重重。奥利格尔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部分人在革命受到挫折时的情绪和心理。他的主要作品有《客人》，《荒原》，《季姆卡》，《狼》，《大赦》，《流浪》，《春天的节日》等，发表在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的《西伯利亚问题》杂志上。作品问世以后，在西伯利亚轰动一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可惜，有些作品的思想倾向十分消极，对于唤起工人阶级的觉悟是有害而无益的。《荒原》在这类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荒原》的基本思想是怀疑人的本性是否会得到改造，革命精神能否对人产生根本的影响。主人公谢尔盖由于投身革命、做党的工作而被流放。他受不了流放生活的孤独，热情逐渐消失，意志也大为衰退，个人主义者的面目暴露出来了。然而，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给主人公作结论，而是要细致、

深入地揭示他在艰苦环境里的精神状态、意识和心理，进而挖掘出其悲剧产生的原因。

当初，谢尔盖参加革命并不是虚假的，然而他对革命的艰苦缺乏认识，也没有树立起坚定的政治目标，因此必然经受不起痛苦的考验。这个人物的悲剧便由此产生。在严酷的斗争面前，他退却了，精神全面崩溃，进而导致了肉体的死亡。

作品中，主人公的精神堕落被揭示得淋漓尽致。谢尔盖自己就说：“思想已不再鼓舞我的精神，我……失去了自己的整个生命，连同一切希望和渴求：整个的‘我’已付诸东流，这些岁月又有何意义？”《荒原》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达申斯基也同谢尔盖毫无二致，被流放生活的痛苦给吞噬了。为减轻心灵的苦闷，他开枪打穿了自己的手臂。偌大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就是两个人，此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对于他们，“既不存在国家、政治，也不存在社会运动和伟大的事件”，他们生活在“黝暗河水的崎岖陡岸上”。谢尔盖和达申斯基因自己的遭遇而憎恨整个世界。过去的一切在这两个被抛到冻土带的荒僻村庄里的人看来，都十分藐小而无谓，他们失去了一切高尚的目标和道德准则。这样的人虽然活着，却离真正的生活愈来愈远。

小说中还有一条爱情线索，烘托着作品的思想、心理内容。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来到了流放者中间，

这引起了谢尔盖和达申斯基的争斗。他们都想借对姑娘的爱情来拯救自己的灵魂。结果，两个人都把达吉雅娜一步一步地推向了死亡，使她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流放生活彻底摧毁了这三个人的意志，大自然冻僵了他们的心，使他们的血液冷却，可厌的寂静、荒原和死亡潜入了他们灵魂的最深处。

作者奥利格尔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人本身不具有抵御周围环境的能力，他最终必将成为环境的牺牲品。这正是被革命吓破了胆的知识分子对严酷的现实的认识。他们不过是一时受到革命的吸引而被卷入历史事件的洪流。作家看到了部分俄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和背叛，但却得出了世界和人的本性不可改变的消极结论，从而导致了作品的错误倾向。

奥利格尔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季姆卡》表现的主题思想则与《荒原》完全不同，作品的主人公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人民。

季姆卡是个无忧无虑的农村小伙子。他视自由高于一切，厌恶农奴制乡村无可忍受的规矩，“在村子里总是感到憋屈和烦闷”。为了获得自由的生活，他不惜与母亲发生冲突，甚至对心爱的姑娘也不让步。后来，他因偷盗而被关进监牢，遭到了毒打。他毫不犹豫地杀死了深为众人痛恨的狱吏，在死亡面前始终保持着人的尊严。在狱中，他认识到

现实的不合理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斗争的意义。临刑前，季姆卡既不接受律师的怜悯，也不接受神甫的祝福，因为他明白，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季姆卡的大无畏精神引起了众人的钦佩。相比之下，衣着奢华、满身香水的辩护人的虚伪面目便显露得十分清楚。就连他自己在季姆卡面前也不能不自惭形秽。

在《季姆卡》中，作者试图把知识分子和农村小伙子的思想感情作个对比。知识分子自视为人民的救世主，而革命一旦失败便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农村青年季姆卡却能清醒地看待自己和生活，感情也纯朴、自然。他憎恨出卖别人的人，怜爱母亲，为心爱姑娘的不幸遭遇而痛苦，为美好春天的到来而欢悦。他不想入非非，只求得到自由和快乐。最后，他终于觉醒过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所以，人们在阅读《季姆卡》时便不会感到《荒原》中那种令人生厌的心灵上的空虚和僵死。在这两篇小说中，作家对两种不同类型的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心灵的褒贬态度十分鲜明，说明了作家的倾向性。

而在短篇小说《狼》中，作家则对不同阶级的人的本性作了深刻的揭示。主人公是一位教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如他自己所说：“在生活中，我永远只能占据我应当占有的地方的四分之一，其余的位置都被身穿轻裘、大腹便便

的胖子们占去了。”他要起来反抗这种不合理的现实，悄悄地开展起发动群众的工作。他把新迁来的贫困人家看做自己的阶级伙伴，经常到他们家中去访问，希望在他们愚钝、压抑的心灵中燃起“仇恨的火焰”。

教堂的助祭库米罗夫是教师的死敌，可是，教师为了从城里运来革命书籍又不得不向他去借马匹。这样一来，教师就落到了这个胆小如鼠的坏蛋手中。无奈，他只好用枪来威逼助祭，使他感到一种兽性的恐惧。库米罗夫对教师又恨又惧，等待时机以求报复。“两个人坐在狭小的轻便雪橇里。远远望去，人们还以为他们在作友好而愉快的旅行，其实，他们正如一个笼子里的两只饥饿的野兽，双方都以同样的恐惧等待着，看谁先开口去咬对方。”

正在这时，一只野狼向他们猛扑过来，局面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小说的情节发展急转直下。面对死亡的威胁，两个仇人只好暂时联合起来。对于教师来说，这是惩罚要去告密的助祭的良机。然而，教师并未这样作，相反，他却用生命搭救了库米罗夫。临终前，教师在助祭的眼里看到了悔恨的泪花，听到了他在上帝面前的忏悔，“这些话使他感到十分温暖和快活”。死亡象一位美女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个衣衫褴褛的无产者终于在衣着豪华的剥削者身旁死去了。

作者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所表达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概括地说，即敌对阶级之间的相互仇恨不能由斗争来消除，而只能靠仁慈和博爱来和解。在作者看来，严酷的革命斗争未必能改造已经堕落了灵魂，它只能受到无私的人性的震动。其实，库米罗夫内心的省悟并没有阻止他去干高利盘剥的勾当。他只是向上帝祈祷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象狼一样活着，互相撕咬着身上的鲜肉，因为我們都很饥饿。上帝呀，不要责怪我们！”可见，即令是教师无私的人性，也并未改变库米罗夫如狼似虎的本性。小说在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互相矛盾的。这是形象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它是不以作家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从上面列举的几部作品不难看出，奥利格尔沾染了部分俄国知识分子的悲观失望情绪，在革命遭到失败的关头丧失了信心。因此，他前期创作的揭露性中篇小说《大赦》、《末日的审判》的健康情调都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后期作品中的感伤、绝望的情调，以及庸俗小市民的情趣。他的注意力愈益集中到道德伦理问题上，但由于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感到极度的惶恐和失望，他自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后来，他对革命完全丧失了信心，竟去求助尼采学说。《流浪》和《春天的节日》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思想。

奥利格尔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倾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作家都很同情政治流放犯，但这种同情既肤浅又片面。他们只看到流放者的不幸处境，却看不到他们的高尚品格，也不去描绘他们的艰苦斗争，更没有塑造出在流放中坚强不屈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这些作家至多不过是把他们看作沙皇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为他们感到惋惜而已。《塔纳》、《在黑夜里》、《光天化日之下》等作品的内容无不如此。

一九〇五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除上述类型的作品而外，讽刺作品也盛行起来。作家们开始注意社会问题，政治斗争成了他们创作的主要题材。格·格列宾希科夫和阿·叶尔绍夫可算是当时最著名的讽刺作家。

格列宾希科夫的代表作是《狗群》。篇名《狗群》是对乡间恶霸马克西姆·费多蒂奇和牧师谢苗的强盗本性的揭露。这些恶棍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极力封锁进步思想，不许村民受教育，把诚实而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教师安娜·加芙里洛夫娜凶狠地赶出了村庄。作者用辛辣的讽刺抨击了当时西伯利亚乡村中的统治者，以嘲笑的口吻描绘了他们控制下的村庄里的生活图景：

“我们的村子与西伯利亚的普通村落一模一样。一座精工巧筑的教堂傲然地雄踞在村中的高地上，